

中国向老挝派出桑怒工作组始末

时伟通

内容提要 1963年10月,中国决定向老挝人民党中央驻地桑怒派出工作组,帮助寮方做好在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工作。桑怒工作组的派出不仅是为了帮助和指导寮方革命,更在于全方位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将巴特寮革命打造成全面践行中国革命经验的样板,证明中国革命经验的有效性和普适性,进而在世界范围内与美苏争夺影响力。此外,桑怒工作组也代表了支援他国革命的一种新方式,其本身是一个试验,中国也做好了推广这种实践的准备。然而,由于越南劳动党的阻挠和中国的革命经验不适用于老挝的具体条件,桑怒工作组仅仅派出一年多后即已无法进行实际工作,中国的革命经验也在老挝失去了可资输出的载体。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老挝 桑怒工作组 越南顾问团 越寮“特殊关系” 中国的革命经验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5年底老挝革命胜利这30年是老挝国内的

* 时伟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本文是牛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冷战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ASS00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牛军教授、张清敏教授、外交学院梁晓君副教授对本文的指导和建议,以及《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冲突动荡期。然而,由于长期处于越南战争的阴影下,老挝的冲突成了一场“被人遗忘的战争”。^① 同样,当学界将目光聚焦在中国的“援越抗美”政策之时,与此几乎同时进行的“援老抗美”也几乎被遗忘。大量史料表明,中国对老挝人民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同样给予了大规模的支持和援助。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到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巴特寮的实际物资援助者。^② 1963年10月,中国更是决定向寮方中央所在地的桑怒(Sam Neua)派出一个负责“建党、建军、根据地、民族、自力更生”等方面工作的、具有全面性质的工作组,将中国对巴特寮革命的支援推向了高潮。本文正是探究这一决策的始末及背后的中国诉求。

近年来,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中外学者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他们或认为这是对越南南方武装斗争的支持,或认为是反修斗争的必然要求,或认为是对美国安全威胁的反应。^③ 然而,档案材料已经揭示,北越并不满意中国的这一决策,只是不得不同意而已。^④ 此外,在桑怒工作组派出前,中国并不认为美国会发动世界大战,具体到美国在老挝的政策则认为“现在是稳住老挝,不会出兵干涉”。^⑤ 换句话说,中国并不认为美国在老挝的行动构成了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本文亦不否认中苏关系在其中的作用,然而,中苏分歧是如何作用于

① Paul F. Langer and Joseph J. Zasloff, *North Vietnam and the Pathet Lao: Partners in the Struggle for Lao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

② “巴特寮”是老挝人民党领导下的老挝爱国战线组织及其武装力量的旧称,后改为老挝人民解放军。“老挝人民党”成立于1955年3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活动并不公开。1956年1月成立的“老挝爱国战线组织”(对外又称“老挝爱国战线党”)是老挝人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中国高层私下里常把这些组织统称为寮方。本文会交替使用“巴特寮”和“寮方”,两者是一个意思。具体可见《前寮国战斗部队和老挝爱国党》,《人民日报》1959年5月25日,第4版;《寮国和“巴特寮”》,《人民日报》1975年5月18日,第5版。

③ 持第一种观点的参见 Zhai Qiang,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 120-122; 游览:《冷战背景下越寮特殊关系的演变(1959—1965)》,载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24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持第二种观点的参见冯一鸣:《“二线”与“一线”的纠葛:中越关于老挝问题初期互动研究之二》,《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2018年第2期,第19页。持第三种观点的参见 Xiao Mingzhang, “China’s Involvement in Lao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3—1975”,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6, 2002, pp. 1148-1149.

④ 越劳并不希望中老两党之间有直接的联系渠道,中国是在与寮方达成一致意见后将既成事实通报给越方的。为避免刺激越方,罗瑞卿还有意在通报内容中删去了作为两党之间的联系渠道这一条,具体参见《老挝问题专门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关于筹建桑怒工作组问题》,1963年11月27日,外交部档案馆(以下简称外档),106-01420-01;《关于桑怒机构征求越方意见事》,1963年12月27日,外档,106-01420-03;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⑤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5—317页;《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档案馆,1-16-53,第14页;《对老挝形势的看法和建议》,1963年11月2日,外档,106-01417-02;《驻老使馆一九六三年的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四年的工作规划及部的批复》,1964年2月17日—3月25日,外档,106-00818-01。

这一决策,需要进一步分析。除解释力不足外,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共同的史实错误:桑怒工作组是应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的请求而派出的。事实恰恰相反,1963年9月下旬,在从化举行的四党援寮会议上,周恩来主动提出中国希望在桑怒设一个机构。^①

本文拟运用最新解密的中国外交部档案、地方档案馆档案、年谱、回忆录,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还原这一决策的始末。中国在这一行动背后表现出的主动性,表明桑怒工作组的派出并不仅仅是为了支援寮方革命。进行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廓清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更在于为理解中国革命外交的动力、诉求、影响因素提供一个参照。

一、从限制寮方革命到支持寮方革命

派出桑怒工作组最直接的目标是帮助和指导寮方革命。然而,中国对寮方革命的态度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即从限制、部分支持到全面支持。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4年5月8日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中国与老挝政府并没有直接联系,对越南劳动党(以下简称“越劳”)一手扶植起来的巴特寮也没有多少了解,甚至一度认为老挝人是越南的少数民族。^②因此,中国把老挝当成是越劳领导的印度支那抗法斗争的一个副战场,支持越南解放整个老挝。^③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对老挝有了更深的了解,中国代表团还与老挝代表团进行了直接接触。通过一系列的了解和接触,中国认识到,“老挝与越南不同,并非越南的少数民族,老挝王国政府依然是受到世界上30多个国家承认的合法政府”。^④周恩来还在会议期间明确表达了中国对老挝的期望:希望

① 《关于桑怒机构征求越方意见事》,106-01420-03。

②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Feb. 24, 197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17,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5, p. 777;《柳州会谈记录》,1954年7月3—5日;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60页。

③ 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载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2页;钱江:《越南秘战1950—1954:中国援越战争纪实》,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247页。

④ 《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5月30日,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老挝成为印度、缅甸这样的“东南亚型”国家,即走和平中立道路、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允许他国在老挝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①此外,周恩来还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为老挝的抵抗力量——巴特寮争取到了事实上的承认。老挝问题上的进展也推动会议走出僵局,最终推动会议于7月21日达成协议。老挝王国政府在宣言中声明自己严守中立道路,不参加军事同盟或包括当其安全不受威胁时在老挝领土上为外国军事力量建立基地的义务。^②这一声明也基本上满足了中国的关切。

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开始逐步酝酿一个针对印度支那地区甚至更大范围的东南亚地区的政策——以“和平共处”为话语推动东南亚地区的中立化。推动地区中立化最为直接的目标在于扩大和平统一战线、巩固现有的和平。而更为宏大的目标则在于排斥美国在这里的影响力,并最终在东南亚地区取得领导地位。^③具体到老挝来说,则推动老挝走上一条真正的中立道路,防止美国在老挝建立军事基地;^④排斥美国在老挝的影响力;发挥老挝的示范作用,带动泰国走上中立道路。

为此,中国邀请坚持中立的老挝首相梭发那·富马亲王访华、努力抑制越劳和寮方的革命冲动、支持王国政府和巴特寮通过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中国认为,邀请富马访华不但可以争取富马、推动老挝中立,还可以“扩大亚洲和平区,影响泰国和南越,打击美帝国主义”。^⑤1956年8月19日,富马率领的代表团到达北京开始访问。中国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分别会见了代表团,反复向他们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老挝没有领土野心,中国支持老挝走和平中立道路。在访问过程中,富马表达了建交和接受中国援助的困难,中国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富马也表示,他可以在中泰交往中发挥桥梁作用。^⑥

①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外长6月16日访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谈话记录》,1954年6月16日,外档,206-00005-05(1)。

② 《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1954年7月21日,206-Y0037,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一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牛军:《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60—1965)》,《国际冷战史研究》第23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

④ 1954年9月6日,美英泰等国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明确将老挝列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国家”。

⑤ 《关于老挝王国首相富马访华的来往电报》,1956年5月1日—10月31日,外档,204-00206-01(1)。

⑥ 《老挝首相富马访华简报》,1956年8月16—31日,外档,204-00029-02(1)。

为抑制越寮的革命冲动,周恩来建议越方采取主动,逐步撤出在寮方的志愿军;让驻越大使罗贵波婉转批评苏发努冯亲王在与王国政府谈判中开出的较高价码和急于求成的行为。他还反复向越方解释并希望越方向寮方传达,老挝局势事关亚洲和平,巴特寮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届时中国不可能向朝鲜战争那样派出志愿军;老挝没有革命形势,现在只能是走和平中立道路,哪怕是半中立也是好的。^① 在中国的推动下,王国政府与巴特寮经过了一年多的谈判,最终于1957年11月2日签署了《万象协议》,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将巴特寮控制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交还王国政府、1500名巴特寮武装部队收编进王国政府军等。^② 《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热情洋溢的文章,认为这是“老挝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石”,是“老挝人民最大的福音”。^③ 至此,中国为推动老挝中立、限制寮方革命行动、极力将老挝打造成中立试点而与美国争夺影响力的政策终见成效。而这一政策的实施也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美国要想控制老挝也不会那么顺利,也不打算真的进攻中国大陆,也自然威胁不到我们”。^④

然而,好景不长,在美国的压力下,中立派的富马亲王下台。1958年8月18日,亲美的右派培·萨纳尼空组阁。培上台后,开始执行一系列亲美政策,排斥和打击老挝爱国战线,迫害寮方成员。^⑤ 1959年5月13日,王国政府军包围等待收编的两营巴特寮武装士兵,限他们在24小时内缴械,随后,将苏发努冯等爱国战线领导人软禁,开始大肆屠杀爱国战线党成员。5月24日,突围的

①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上,第613—614页;《苏联驻中国大使馆1956年工作报告》,1957年4月18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七卷,第216页;《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1957年3月5日,外档,106-00116-03;《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1957年3月5日,外档,106-00116-03;《齐敏亚宁与李志敏谈话纪要:越南的政策与中越关系》,1957年9月18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第七卷,第31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越南驻华大使阮康关于老挝问题的谈话记录》,1957年6月11—12日,外档,106-00116-01(1)。

② Martin E. Goldstein, *American Policy Toward Laos*,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s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16-117; 秦钦峙等主编:《老挝战后大事记:1945年8月—1984年12月》,昆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1985年,第28—29页。

③ 《老挝王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石》,《人民日报》1957年11月6日,第5版。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205页。

⑤ 《老挝当局加紧镇压和暗害寮方人员》,1958年4月30日,《情报简讯》第13号;《老挝局势日趋恶化》,1959年1月28日,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91期,第9—10页;《老挝爱国党遭受迫害》,1959年2月25日,中联部:《各国共产党简况》总第223期,第11—12页;《我将坚决打击老挝破坏日内瓦协议的阴谋》,1959年2月28日,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98期,第1页。

第二营在川圪附近与政府军交火,老挝内战由此打响。^①6月初,老挝人民党召开中央全会,明确将美帝国主义作为斗争对象、决定由政治斗争转向武装斗争。^②就在老挝局势急剧恶化的时刻,越南劳动党的南方策略也发生变化。1959年1月12日—23日,越劳中央秘密召开了扩大的二届十五中全会,将武力统一南方重新提上了日程。此时,老挝南部走廊也就是“胡志明小道”的价值凸显出来。为保证运输通道的畅通,越劳中央趁老挝局势动荡之际向巴特寮增派顾问人员;越南人民军总军委还于5月19日专门成立559军事运输团,负责开辟经过老挝向南方运送物资和武器的运输路线。^③越寮“特殊关系”进一步加强。

老挝形势的发展让一直推动老挝中立的中国陷入尴尬境地。事实上,中国也已经不可能再反对越寮双方的武装斗争热情。早在1959年2月,张闻天访问越南时就默许了寮方采取一定程度的自卫。^④然而,中国依然认为寮方应坚持有限自卫,“队伍不要太大,活动不要太猛,避免引起敌人过分注意”;此外,中越军队不能越界,老挝的斗争要靠自己,要作长期准备。^⑤中国采取这种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源于中国不希望老挝的冲突会导致美国的干涉,从而把正致力于国内建设的中国拖入另一场朝鲜式战争;另一方面,寮方的力量也决定了其必须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然而,中国的这种态度不可能不引起北越和寮方的不满,甚至一度比中国还要谨慎的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颇有微词,认

① 《老挝政府下令解散寮国战斗部队并已软禁苏发努冯亲王》,1959年5月16日,《情报简讯》总第114号;《老挝政府正图消灭寮方力量》,1959年5月19日,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132期;《老挝政府进攻寮方部队的情况》,1959年5月22日,《外事动态》总第133期,第5—6页;《我目前对老挝局势的估计》,1959年5月28日,外交部编:《外事动态》总第136期,第1—4页。

② 中共中央联络部亚洲二组编:《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全会文件汇编》(内部资料),1975年7月,第6—9页。

③ 越南国防部军事研究院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二集,廖贤春等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5页;P. F. Langer and J. J. Zasloff, “Revolution in Laos: The North Vietnamese and the Pathet Lao,” *Memorandum*, RM-5935-ARPA, Rand Corporation, Sep. 1969, pp. 141-147.

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年谱》下卷(1942—1976),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3—1124页;“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Christopher E. Goscha), i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Issue 12/13, Fall/Winter 2001, p. 279.

⑤ 《张闻天副外长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老挝局势问题》,1959年5月25日,外档,109-00873-04;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传记年谱编写组编:《张闻天年谱》下,第1140页;《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会谈记录:关于台湾问题和中印关系的争论》,1959年10月2日,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八卷,第431页;《毛泽东会见老挝人民党凯山谈话纪要》,1959年10月5日,中联部;《毛泽东接见外宾谈话记录汇编》第4册;《陈毅副总理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0年1月22日,外档,109-00934-01。

为中国误判了形势,导致爱国力量受到迫害、内战爆发。^①

1960年8月9日,老挝皇家卫队第二伞兵营营长贡勒中校趁内阁大臣前往琅勃拉邦参加国王葬礼的时机,在万象发动政变,推翻了老挝右派政府。控制万象后,贡勒公开了反美态度,并邀请富马亲王出山组阁。美国支持的右派力量前往南方的沙湾拿吉组建了“老挝反政变革命委员会”,老挝出现了两个政府对峙的局面。贡勒政变后,越劳和巴特寮立即与贡勒合作。随后,以贡勒的力量和巴特寮为一方、以富米·诺萨万为首的右派力量为另一方的老挝内战全面爆发。9月,越劳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大规模加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②越南人民军再次进入老挝帮助巴特寮和贡勒作战。12月中旬,在右派的进攻下,贡勒的军队和巴特寮军队退出万象。1961年1月1日,贡勒和寮方联军在越南人民军的帮助下重新解放了查尔平原,并将中左力量的总部设在川圹省的康开。老挝危机爆发后,各大国和相关国家纷纷介入。其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支持万象的右派政府,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支持以富马为首的在康开的临时政府,老挝也因此成了冷战的缩影和两大阵营对抗的前沿地带。

老挝危机爆发前后也正是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转变时刻。基于“东风压倒西风”的整体形势判断再加上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刺激,中国的对外政策开始走向激进,越发强调斗争和革命。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老挝危机的爆发使东南亚进入多事之秋,利用这个形势促进整个地区的革命化对我们是有利的;老挝问题解决得好,东南亚就会起变化。^③寮方革命因此被赋予了推动地区革命化试点的意义。在万象保卫战前夕,中国不仅积极说动苏联为贡勒和寮方提供武器和物资援助,而且从1961年1月开始通过越方向寮方提供武器,还向富马亲王提供资金支持。^④

① 《齐米亚宁致苏共中央报告:关于中国的状况和苏中关系》,1959年9月15日,《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第八卷,第404页。

② 《我驻越使馆关于1960年9月份越南动态综合报告》,1960年10月12日,外档,106-00531-08(1)。

③ 《毛泽东主席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纪要》,1961年6月13日,外档,204-01445-04;《周恩来总理、张宗逊副总参谋长等同苏发努冯亲王的谈话记录》,1961年7月3日,外档,106-01394-14;《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5月5日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备忘录答复》,1961年5月9日,外档,109-03775-04。

④ 《周恩来总理就老挝问题接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和苏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及苏大使向周总理面交的文件》,1961年1月14日,外档,109-03754-02;《援助贵宁八万美元事》,1961年3月4日—3月9日,外档,106-00616-01;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3, pp. 122-156。

中国对老挝尤其是巴特寮革命的重视还体现在一系列中老直接联系渠道的建立和机构派出上。从1961年3月初到1962年9月,中国先后向老挝派出了新华社记者组、驻丰沙里的总领馆、驻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和驻老挝大使馆。此前,中国大都是通过驻越使馆来了解老挝的情况。1961年3月初,中国向查尔平原派出了以张瑶为首的临时记者小组,小组的实际使命是负责搜集情报,负责调查老挝的战场形势、寮方的情况及越寮关系。^①后来,记者小组又扩大为常驻性质的记者组。记者组开始越过驻越使馆直接与外交部、新华社、总参、军情等部门联系,并将情报搜集的范围扩大到巴特寮的基层单位,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与寮方的直接联系渠道。^②

1961年4月下旬,富马访华时与周恩来达成协议,中国帮助老挝修建一条连接云南勐腊和老挝丰沙里帕卡的公路。中国认为这条公路具有战略意义,“是我们向东南亚的一个重要出口”。为统筹公路建设、争取丰沙里的坎温(亲富马的中立派)势力,中国决定在丰沙里派出一个总领馆。外交部于9月18日制订方案,规定了总领馆的任务是了解情况、统筹援助,除与坎温联系外,还要同寮方建立联系、了解寮方情况,实际上是要总领馆起“军事代表团的作用”。^③因此,总领事由云南军区派出的少将丁荣昌担任,总领馆的主要干部也都有一定的军事斗争经验。10月下旬,丁荣昌等到达丰沙里,丰沙里总领馆正式开馆。

在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开馆之前,中国向老挝派出的最高外交机构是驻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在代表团派出之前,外交部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筹备小组根据中央指示拟定专门文件,规定了代表团的性质、

① 记者小组发回的报告可见《老挝当前军事斗争的一些情况》,1961年3月23日,外档,106-00960-01;《越南驻老挝顾问团党委书记周辉敏同志在全体连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讲话》,1961年3月31日,外档,106-00960-04;《老挝桑怒情况》,1961年4月27日,外档,106-00960-02;《关于老挝和中国、越南的关系问题的几点主要情况》,1961年5月4日,106-00960-03。

② 记者组发回的报道可见《老挝三方谈判事》,1961年6月1日,外档,106-00948-01;《老挝当前局势和斗争任务》,1961年6月10日,外档,106-00948-01;《寮方的政治纲领(草案)》,1961年6月25日,外档,106-00948-01;《寮、越方对老挝“八·九”政变一周年的看法和做法及我方态度》,1961年7月30日,外档,106-00952-01;《驻老挝记者李大达情况汇报摘要》,1961年8月2日,外档,106-00964-09;《寮方在万象省当前的工作情况》,1961年8月8日—8月12日,外档,106-00614-02;《贡勒对统一军队的看法和打算》,1961年10月20日,外档,106-00962-08;《巴特寮部队的供应情况》,1961年11月16日,外档,106-01370-04。

具体可见《关于开展云南与老挝丰沙里省边境贸易的报告》,1961年3月6日,外档,106-00618-04;《坎温要求派代表团来访的信件和复信》,1961年3月7日—4月11日,106-00618-02。

③ 《我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和驻丰沙里使馆的工作方针和任务》,1961年9月18日,外档,106-00632-13;《关于在老挝丰沙里设立总领事馆的请示等》,1961年8月1日—10月20日,外档,106-00949-01。

工作方针和任务。文件指出“老挝在东南亚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当前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加强对老工作,对于老挝今后革命与东南亚局势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规定代表团的性质是“我国驻老挝的最高代表机构,领导丰沙里总领馆和新华社记者组,实际执行大使馆任务,并且还要起军事代表团的作用”;任务上则规定代表团不仅要“巩固发展同富马政府的联系,并同寮方建立联系,贯彻执行援老、援寮的方针”。^① 另外需指出的是,具有少将军衔、长期在军队工作的刘春被任命为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老挝。11月14日,何伟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到达川圹,代表团正式成立。

从这些派出机构及其人员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中国非常关注老挝的战场形势和军事斗争。为此,总参甚至还在1961年6月向老挝派出专门观察战场形势、获取情报的秘密军事小组。^② 此外,相比于富马等中立势力,中国重视与寮方的关系,富马等中立派仅仅是中国统战的对象。陈毅还把富马比作楚汉争霸中双方都极力争取的韩信。^③

尽管中国对老挝尤其是巴特寮革命赋予极大的期望,但是,中国依然有着现实的考虑。首先,中国仍不希望老挝内战演变成一场两大阵营都参与的局部战争,从而把自己再次拖入一场“朝鲜式样的战争”;其次,寮方的力量仍不强,要想彻底夺权仍需要时间;再次,中国国内面临的经济困难也限制对寮方的全方位支持。^④ 因此,中国最终决定响应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呼吁,推动召开扩大的日内瓦会议。

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清晰揭示了中国的考量。具体来说,从战略上讲保持东南亚局势的不稳定状态对该地区革命方针是有利的,是有利于中国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⑤ 然而,从策略上来说,对老挝革命斗争需要来说,转入政治斗争为主军事斗争为辅是必要的;“要争取达成协议,维持

① 刘春:《曲折的中老建交与首次出使老挝》,《外交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第9页;《关于我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的工作方针和任务》,1961年9月17日,外档,106-01367-02。

② 《老挝军事小组情况汇报》,1961年6月1日—12月30日,外档,106-00963-01。

③ 《陈毅同志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1961年7月20日,天津市档案馆,x0003-y-011438,第4页。

④ 《老挝政变四个月以来的形势》,1961年1月24日,外档,106-00964-02;《陈毅同志在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会上的报告》,1961年8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全宗号22,目录号:1,卷宗号:598,第4、8页;Marek Thee, *Notes of a Witness: Laos and the Second Indochinese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3, pp. 251-252。

⑤ 《陈毅同志在北京市高等院校毕业生会上的报告》,1961年8月10日,北京市档案馆,全宗号22,目录号:1,卷宗号:598,第8页;《章汉夫同志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1962年1月6日,外档,102-00100-01。

一个暂时和平的局面,等待时机成熟,逐渐取得整个老挝”。^①

1961年5月16日,由十四国参加的日内瓦会议召开。1962年5月,越寮联军一举攻下老挝南塔,这既推动了6月份老挝三方联合政府的成立,也推动会议于7月23日通过《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宣言的议定书》而成功闭幕。如同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一样,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实质性的主导作用,会议结果也的确满足了中国“维持一个暂时和平局面”的期待。实际上,不仅中国认为这是权宜之计,而且老挝内部的左右两派都认为如此,这也为后来联合政府的破裂埋下伏笔。

二、中国积极主动要求派出工作组

1962年7月10日,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前夕,外交部任命刘春为临时代办,并带领经济文化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前往万象负责使馆筹建工作。刘春到达万象后,与右派及右派迎立的台湾的“大使”杭立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终,在老挝中立派的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支持下,中国与老挝正式建交。10月12日,刘春向国王递交国书,驻老使馆正式开始工作。联合政府成立后,万象也成为老挝政治斗争的中心,寮方也在万象成立办事处,苏发努冯、富米·冯维希等寮方领导人还进入政府担任要职。万象使馆成为中国和寮方联系的另一渠道。

尽管老挝左、中、右三方成立了以中立派为首的联合政府,但三方仍然是上统下不统、各自发展力量。寮方也接受历史教训,坚持军队不汇编,保持武装和根据地的独立,以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发展力量,“进而使老挝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②同时,中美两国也继续支持各自的追随者,美国还积极拉拢富马、贡勒等中立人物,最终推动他们倒向右派,联合政府出现实质性的破裂。

1963年4月1日,联合政府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在万象遇刺身亡,随即以巴特寮为一方、以贡勒为另一方的老挝内战在查尔平原再次爆发,且贡勒受到右派的支援。4月12日,中立派的坎堤中校遇害身亡。寮方在政府中的官

^① 《陈毅同志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报告》,天津市档案馆,第6页;《章汉夫同志报告日内瓦会议情况》,1962年1月6日,外档,102-00100-01。

^② 刘春:《中老建交与首次出使老挝》,载刘晓、伍修权等编著:《我的大使生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7页;《凯山谈目前局势和今后斗争的看法》,1962年7月31日,外档,106-00692-03。

员出于安全考虑相继撤离万象。^① 1963年9月9日,富米·诺萨万控制的右派军警包围了老挝爱国战线军事代表团的住宅和警卫部队驻地,打死一名老挝爱国战线士兵,制造了“万象事件”。寮方留守人员也开始撤出,联合政府实际上已完全被右派控制。^② 在这种情况下,驻老挝使馆基本上已经无法与寮方直接联系。

内战爆发后,中国与富马政府的关系也日趋恶化,万象使馆的作用逐步降低而驻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的作用凸显出来。1963年5月24日,外交部决定从驻万象使馆抽调戴璐和另一名官员前往代表团、并拟派往使馆的周忠良去代表团,以“积极支援老挝人民的革命斗争,密切和寮方的关系,进一步研究掌握川圹局势”。^③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凯山访华并与周恩来达成口头协议,希望中国能派一个军事工作组到寮方中央,帮助寮方解决在查尔平原战争中的困难。中老两党在口头上达成协议,然而,当寮方将此事告知越劳中央时却得到“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应通过越南来实施对老挝的各项援助”的答复。^④ 派出直接的军事工作组虽因越方的阻挠而没有成行,不过,中国决定继续加强经济文化代表团。

7月20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决定向代表团加派军事、调研工作和苗族工作等方面主要干部十人,以加强同寮方的联系、“帮助寮方的基本建设和当前斗争”,并准备将此事告知寮方和越方后派出。^⑤ 然而,凯山一直没有明确表态。1963年9月下旬,在广东从化温泉宾馆召开了中、越、寮、印尼共四党联合会议,商讨援寮工作。在9月26日的第六次会谈上,周恩来提出中国准备向桑怒派出一个机构。9月27日,凯山才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国加强代表团、增派人员。有意思的是,凯山并非直接表态,而是在让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邓昆山带给老挝人民党副总书记、驻川圹地区负责人诺哈的一封信中表示的。^⑥

在凯山没有明确表态的情况下,外交部指示驻越大使朱其文利用凯山去

① 《冯维希谈如何撤出万象问题》,1963年4月13日,外档,106-01417-03。

② 新华社国际部编:《老挝问题大事记(一九五四年七月—一九七二年底)》,印度支那问题内部资料,1973年1月,第76页;《周恩来总理同越南大使谈冯维希撤离万象事》,1963年9月9日—9月10日,外档,106-01418-03。

③ 《关于戴璐等同志去康开工作事》,1963年5月24—27日,外档,106-01107-02。

④ 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第41—42页;梁文英:《在老挝的日子》,昆明:云南国际友好联络会·云南社科院东南亚所1991年版,第3页。

⑤ 《关于我加强驻老代表团问题向寮方征求意见的请示》,1963年7月20日,外档,106-01420-02。

⑥ 《凯山要邓昆山转告诺哈的几个问题》,1963年9月27日,外档,106-01420-02。

河内的机会向凯山探寻。10月8日,凯山告诉朱其文,欢迎加强驻康开的经济文化代表团,并从中派一工作组到桑怒,希望能派出较能掌握全面工作的同志到桑怒,主要是掌握根据地建设,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生产、民族工作、社会调查等方面,而在康开的人员,重点应放在军事方面。驻越使馆认为凯山的这次请求与这次从化会谈有关,是好的表现,并建议把人员重点放在桑怒上。^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在派出桑怒工作组一事上远比凯山积极,凯山的请求只是给了更正当的理由。

驻越使馆报回消息后,周恩来于10月12日指示外交部约总参、军情和中联部一起开会研究。10月21日,外交部会同上述三部讨论后,呈递报告。报告建议派出桑怒的机构名称上应以“工作组”为好,以区别于越劳派驻那里的顾问团;选调一名有根据地武装斗争经验的少将级干部任组长,并选派有根据地建设和地方党群工作经验的省委常委级干部任副组长,再配备军事、军队政治、后勤、地方财经和民族干部等。

最为突出的是,报告建议,“考虑到老挝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应有明确分工,外交斗争和政治斗争由外交部负责;另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负责“对于帮助寮方进行革命建设的秘密工作,即关于寮方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和秘密物资援助等方面的工作”,桑怒工作组由这个小组负责。10月24日,周恩来批示,将工作小组设在总参,以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为组长。^②自此,老挝工作小组成为负责协调中国援寮事物的专门协调和领导小组,这也凸显了中国对援寮革命的重视。杨成武在向毛泽东汇报中央老挝小组会议情况时,毛泽东指示,要进一步加强对于老挝的援助,把老挝爱国战线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全包下来。^③1950年3月,毛泽东在会见即将赴越的援越军事顾问团成员时专门强调:“不是我们自己要去,是胡志明请我们去的。”^④仔细对比这两个指示,不难看出前后的变化。在援越军事顾问团的派出上,中国领导人内心充满了道义上的优越性,而在桑怒工作组的派出上则显得有些有求于人。

11月初—12月底,中央老挝工作小组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讨论桑怒工作组的组成人员。会议决定工作组由21人组成,由具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解放

① 《凯山谈我加强康开代表团成员事宜》,1963年10月8日,外档,106-01420-03。

② 《关于筹建我驻老挝桑怒机构的请示报告》,1963年7月6日—12月25日,外档,106-00751-03。

③ 杨成武年谱编写组:《杨成武年谱》,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第385页。

④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军少将段苏权任组长、云南省红河地委书记梁文英和军事干部、解放军大校朱英任副组长,并配备5名其他干部,外加13名工作人员。11月27日,在第二次专门会议上规定了桑怒工作组的性质,它是“我党中央派出的同老挝人民党中央联系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机构”。任务是“对老挝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在建党、建军和根据地建设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基于调查研究情况向中央反映情况、提出意见”;“根据我党中央指示向老挝人民党中央转达意见,以及根据对方要求向我党中央转达意见”。^① 第三条实际上是要工作组作为两党之间直接联系的渠道。

一切筹备工作完成后,外交部于12月27日指示驻越大使朱其文将派出工作组一事通报越方。1964年1月4日,越劳中央政治局和胡志明同意中方派工作组前往桑怒。1月15日,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指示朱其文告知越方工作组的性质、人员配备及动身时间。为避免刺激越方,罗瑞卿删掉了工作组的第三条任务。越方表示“这不仅是对寮方的帮助,也是对越方的帮助,越方将与工作组很好地合作”。1月18日,工作组开始分两批派出。^②

从向越方通报的过程中可看出,中国清楚越劳并不满意中国的决策。然而,中国依然决定将既成事实通报给越方,说明中国已经认识到越方不可能再次拒绝。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即便越方再次拒绝,中国依然会派出工作组。1963年11月下旬,越劳中央召开三届九中全会,决定大幅加强在南方的武装斗争。^③ 越劳在无法指望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只能寻求中国的帮助,因此,也不可能拒绝中国派出工作组。按照中国和越劳的分工,巴特寮革命本应由越劳指导和负责,越劳也一直将老挝视为自己的后院。桑怒工作组的派出打破了传统分工,也把中国推向了支援寮方革命的“第一线”。越劳中央虽然被迫同意了中国的请求,但一旦新的条件出现,越南必然会反弹,这也为桑怒工作组之后的工作和最终的撤出埋下伏笔。

从这里也说明了派出桑怒工作组并不是对越南革命的支援,甚至有学者

① 《老挝问题专门小组第二次会议纪:关于筹建桑怒工作组问题》,1963年11月27日,外档,106-01420-01。

② 《关于桑怒机构征求越方意见事》,1963年12月27日,外档,106-01420-03;《关于建议驻老挝工作组的来往电》,1964年1月4日—2月7日,外档,106-01510-01;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史》,第83页。

③ 《黎笋在越党九中全会上讲话阐述国际问题 强调要像仇恨帝国主义那样来仇恨现代修正主义》,载《兄弟国家和兄弟党报刊材料》,1964年2月29日,第24—44页。

认为,桑怒工作组的派出标志着中国开始将越劳和寮方分开来看。^①这也可以从两份文件的对比中看出来。1962年11月8日,在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的发言中,康生提到了中、朝、越、印尼、日本、缅甸、马来亚、泰国等亚洲党在中苏论战中的一致态度,^②根本没有提到与越劳保持一致而支持中国的老挝人民党。而到1964年8月7日,外交部一份关于向左派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友好国家通报越南及东南亚情况的安排中,已经把巴特寮和越南及朝鲜归到第一类“需要以最迅速及时的方式告知”的行列。^③

中国不仅在工作组的筹备和派出上保持了热情,还全面抬高工作组的地位。中国并没有按照凯山所请求的,让工作组作为经济文化代表团的派出机构前往桑怒负责根据地建设,让留在查尔平原的人员专门负责军事工作,而是将工作组打造成了一个负责全面工作性质的机构,并将先前拟派往查尔平原的军事小组成员并入到工作组。^④这一安排也使得桑怒工作组成为中国向老挝派出的所有正式机构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中央老挝工作小组副组长、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曾指示段苏权:“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要知道,但使馆知道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⑤

这一切都说明,派出桑怒工作组不仅仅只是为了在两党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渠道,也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和指导寮方革命,而是有更宏大的诉求。

三、树立新的革命样板

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结束也开启了中国外交的全面左转。经过1962年7—9月间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主要基调。1962年11月,第六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召开,就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外工作作了纲领式的部署。会议明确指出,当今

① Xiao Mingzhang, “China’s Involvement in Lao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3—1975,”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6, 2002, pp. 1148-1149.

② 《康生同志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档号,1-18-148。

③ 《关于将东南亚和越南目前斗争情况通知左派兄弟国家兄弟党和友好国家的工作安排》,1964年8月7日,外档,106-00795-01。

④ 梁文英:《在老挝的日子》,昆明:云南国际友好联络会·云南社科院东南亚所1991年版,第3页。

⑤ 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第41—42页。

“世界大势”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马列主义“三分天下”。代表帝国主义的是美国、代表修正主义的是苏联，而代表马列主义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当今世界，无论是美国“镇压人民革命、独霸世界”的主张，还是苏联“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不要革命”的模式都已经行不通了。因此，中国应该顺“东风压倒西风之势”，勇于承担使命，“逐步建立起我们自己的一套，使北京成为一个国际活动的中心，同帝、修唱对台戏”。具体来说，就是要拿出自己的一套主张而与美苏争夺作为三方势力斗争焦点的亚非拉地区，树立中国在那里的领导地位。^①

在物质援助无法与美苏抗衡的情况下，中国只能在向亚非拉国家提供援助的同时，输出一套不同于美苏的主张和模式。这一新的主张和模式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一直笃信的中国革命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三大革命胜利的法宝；另一部分就是作为思想武器的毛泽东思想。从1962年7月起，毛泽东频频接见前来中国取经的亚非拉左派党，反复向他们介绍中国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革命、自力更生等方面的经验。^② 这加强了中国领导人的信心。在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看来，“只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主席的思想、著作已成为国际共运中广大人民的旗帜”，“是指引世界革命的灯塔”。^③

然而，中国对亚非拉三大洲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对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也给予了不同的关注。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并不具备向三大洲提供整齐划一的物质援助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国内革命和建设“树立典型”“由点带面”模式的影响。^④ 具体到地域来说，东南亚地区优于非洲和拉美。这不仅仅是因为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地缘政治的主要舞台，更在于中国领导人认为，这里是“世界主要矛盾的集中地区之一”，这里的“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有争取革命领导权并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⑤ 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经验可以在东南亚蓬勃发展的武装斗争中得到最为直接的复制。因此，正处于武装斗争的南越和老挝就有了突出的象征意义。早在八届十中全会

① 《康生同志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档号，1-18-148；《第六次全国外事会议传达要点》，1963年2月，长春档案馆，档号，1-16-53。

② 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5卷，第144、161、163、172、174页。

③ 《康生同志讲话》，1962年11月8日，吉林省档案馆，1-16-53；《陈毅副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1963年11月18日，天津市档案馆，x0003-c-015091，第27页。

④ 牛军：《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60—1965）》，第37页。

⑤ 董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上,毛泽东就指示,要无条件支持像南越和老挝那样的武装斗争。^①

牛军教授认为,南越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国在东南亚树立的典型,兼具“革命、反帝、民族解放、走中国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等全方位的模范意义”。^②其实,巴特寮革命不仅具有上述模范意义,更具有南越民族解放斗争所不具备的条件。首先,老挝与中国接壤且处于东南亚的十字路口上,可以起到连接“泰国、柬埔寨、南越、缅甸等国的通道作用”。^③1963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发努冯时就说,“你们站在第一线,东南亚各国会受你们的影响的”。^④其次,南越的民族解放斗争毕竟由北越直接领导,中国难以越过越劳而直接领导南越的民族解放斗争。况且,在日内瓦会议上,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一度让黎笋等领导人看到了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希望。从1962年7月到1963年11月下旬,越劳中央对南方的武装斗争都持消极态度。^⑤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民族解放斗争自然难以发挥中国理想的模范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老挝内战所具有的国际和国内两重含义使得中国认为老挝的情况与中国过去的情况相似,更易于直接复制中国的经验。就国际上来说,老挝内战爆发后,老挝再次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⑥美国继续支持右派并拉拢中立派,而苏联则支持中立派、倡导和平共处的总路线,中国支持巴特寮革命能直接体现与美苏争夺的意味,进而证明中国提倡的革命主张的正确性。进一步说,围绕老挝的斗争是中美苏在世界范围内争夺的缩影。中美围绕老挝问题的斗争本质上是影响力之争,这在老挝危机爆发后就已经显现出来。陈毅曾明确地说,中国不会与美国在老挝直接作战,但必须要保持和美国的斗争姿态,因为“这样有利于中国在亚非拉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⑦老挝内战重新爆发后,中国依然坚持这一思路,通过支持巴特寮

①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4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第73页。

② 牛军:《安全的革命:中国援越抗美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60—1965)》,第37页。

③ 《驻老使馆关于老解放区情况的调研报告》,1964年7月10日,外档,106-00806-01。

④ 《毛泽东主席接见苏发努亲王谈话记录》,1962年9月23日,外档,106-01386-08。

⑤ 游览:《冷战背景下的越寮特殊关系》,第93页;Ang Cheng Guan, “The Vietnam War, 1962—1964: The Vietnamese Commun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35, No.4, 2000, pp. 608-611; 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pp. 201-204。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老挝局势宣传报导上的几点意见》,1963年7月12日,外档,106-01099-01。

⑦ 《陈毅同志在北京市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会上的报告》,第4、8页。

的斗争彰显与美斗争的姿态、宣示自己在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在国内,有着统一领导、一块后方根据地、一支较为完整的武装力量的巴特寮既要与反动派做斗争,还要与支持反动派的美国做斗争。这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日本人走了,美国来了,支持蒋介石、拉拢中立派”,而“苏联又不给实质援助和帮助”。况且,老挝还有着优于中国的游击战争条件,因此,巴特寮最后一定是像中共一样掌权,而“诺萨万会和蒋介石一样失败”。^①由此看来,中国已决心选择巴特寮革命作为践行中国革命经验,尤其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试点。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国就从越南手中接过了对老挝南塔的直接援助,云南开始直接向巴特寮新解放的南塔提供援助。^②1962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苏发努冯时称赞南塔战役打得好,同时要寮方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是维持联合政府,二是准备打。^③1963年4月,老挝内战爆发后,中国尽管不希望出现“中右完全河流与寮方完全分裂的内战局面”,但并不认为老挝联合政府垮台“对老挝革命有什么不利”。中国认为,寮方在政治上继续斗争的同时,“在军事上也要做不怕分裂的准备”;周恩来甚至建议除作必要的防御和自卫外,要准备更大的反击,要打歼灭战;中国还建议中越向寮方和中左力量提供军需和武器,越南还需要准备再度进入老挝作战。^④

在听到中国的意见后,凯山表示完全同意,认为必须给敌人几个沉重的打击;而且还向越方提出派一个营协助给敌人沉重打击;并决定在腊黄地区和敌人打一仗。^⑤凯山这种坚决斗争的态度自然受到中国的欢迎。而越方却认为,寮方不应该主动打,如敌进攻,可以自卫。贵宁被刺后,越南在声明中甚至“连美国的本性没有改变都不敢指责”,辩解显得“有气无力”。^⑥在富马指责其在查尔平原上的专家为军事顾问后,越方表示撤出这些顾问和技术人员。^⑦对于

① 《陈毅副总理接见老挝驻华大使坎京谈话记录》,1963年7月12日,外档,106-01423-02。

② 《周恩来总理与范文同总理谈话记录》,1962年8月28日,外档,106-01394-14。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150页。

④ 《我对老挝局势的看法和意见》,1963年4月13—15日,外档,106-01417-03;《邓昆山同志回国汇报事》,1963年4月29日,外档,106-01107-03。

⑤ 《同凯山谈老挝局势问题》,1963年5月7日,外档,106-01417-06。

⑥ 《我对老挝局势的看法和意见》,1963年4月13—15日,外档,106-01417-03;《驻老挝代表团一九六三年军事友好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四年工作规划》,1963年12月14日—1964年1月31日,外档,106-00818-02。

⑦ 《越南对老挝局势的看法》,1963年1月11日—6月23日,外档,106-01095-02。

直接出兵作战,越方则表示出更大顾虑,认为这在政治上不利,因此,只准备“提供一部分干部并协助指挥作战”。^①越方的这种顾虑态度不可能不影响到寮方,致使在整个五月份,寮方虽进行自卫反击,但主动进攻不多。^②

6月上旬,寮方做出了主动攻打坂顿的计划,并就作战方案征求中方的意见。中国同意寮方的出击计划,并建议寮方打歼灭战。然而,由于越南并不热心,攻打坂顿的计划一再延迟,而此时老挝进入雨季、双方的斗争也进入了僵持阶段。^③进入7月后,受到越方影响,寮方在军事斗争中的热心已经不大,“怕大打会造成政治被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决定加强驻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推动寮方的斗争热情,而寮方很长时间对此都没有表态。在连接越南和桑怒根据地的7号公路受到右派攻击和土匪骚扰的情况下,中国甚至建议“越方进来三、五个营协同寮方作战”,但越寮双方依然不热心。^④一直到8月底,越寮的这种谨慎态度并没有改变。越南对出兵寮方所持的谨慎态度既源于前文所提到的对和平统一的幻想,当然,也受到苏联此时和平共处政策的影响,正因如此,前述研究才认为中国重视的是越寮双方在反修斗争中的态度。然而,有必要对中苏分歧的作用实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中苏分歧从来就不仅仅是关于战争、时代主题、革命等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更在于亚非拉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影响力之争,其实质在于和平共处和革命两种模式之争。1960年老挝危机爆发后,两种模式之争在老挝已凸显。1960年12月,苏联开辟了一条空中走廊,向万象的贡勒武装和寮方提供武器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己的中越盟友显示“和平共处”的有效性。老挝三方联合政府的成立及日内瓦协议的达成更加坚定了苏联对自己模式的认同。

日内瓦会议一结束,苏联就宣扬这是自己的胜利,之后又关闭了空中走

① 《黄文欢谈老挝情况》,1963年5月5日,外档,106-01417-06。

② 《五月份的老挝局势和使馆的看法》,1963年5月31日,外档,106-01110-02。

③ 《寮方攻打坂顿的计划和我们的意见》,1963年6月11—15日,外档,106-01417-01;《川圹地区综合情况报告》,1963年7月2日,外档,106-01110-03。

④ 《对寮方最近采取重大措施的看法和意见》,1963年8月31日,外档,106-01110-02。

廊、切断了对寮方的直接援助,理由是一切要通过联合政府。^① 老挝内战于1963年4月重新爆发后,苏联一方面与美国联系,宣扬继续支持日内瓦协议;另一方面,则主张一切通过富马的联合政府,支持富马的一系列要求,并继续向贡勒提供援助,更为重要的是反对寮方的武装斗争。总之,老挝已经成了苏联“和平共处、和平中立”的榜样。^② 而中国必然会支持寮方的武装斗争以彰显与修正主义的总路线斗争的意味。1963年6月《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建议》的发表,以及7月中苏两党会谈的破裂更坚定了中国通过支持寮方的武装斗争而证明自己的主张和模式正确性的决心。

而对于越寮是否明确表态反修并不是中国的真正关切。中国清楚苏联对越寮的态度也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支持苏联。1963年5月,中国也下发了反修通知,对越寮的处境表示理解,并不强逼他们表态。^③ 后来的实践也表明,越寮双方已经表达了自己的反修态度,比如,表示支持中国的总路线和中国在“片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裁军问题上的观点。中国真正关注的是越寮是否走中国的道路、坚决进行武装斗争。刘少奇出访越南并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越南在反修斗争中明确表态,更在于推动越劳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因此,他才说“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④ 6月4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会见黎笋等人的谈话可以清晰地反映中国真正的关注。他表示,老挝“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被压迫民族”,老挝的重任“落在苏发、凯山、你们和我们身上了”;他还明确向后者表示,“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不行,“只小打不大打”也不行,向苏联少借点,要自力更生。^⑤ 这可以

① 《范总理告朱大使如下事项》,1962年9月28日,外档,106-01394-10;《关于开辟航线问题》,1962年10月11日,外档,106-01426-05;《苏援富马运输机六架》,外档,106-01426-03;《越大使所谈情况》,1962年12月8日,外档,106-01426-05。

② 《苏联对老挝局势的反应》,1964年4月19日—6月20日,外档,106-00749-02;《美国对老挝问题的态度》,1963年4月30日,外档,106-01093-02;《关于苏联驻老挝大使谈话问题》,1963年5月3日,外档,106-00749-03;《朱大使同老挝、越南领导人谈老挝局势》,1963年4月12日—6月30日,外档,106-01117-02;《老挝国际委员会波兰代表马列克对老挝局势的看法》,1963年5月20日,外档,106-01117-02;《贡勒赴苏联治病》,1963年6月3日,外档,106-01101-01;《中方参加五党会议的方案和发言稿》,1963年6月14日—6月28日,外档,106-01426-01。

③ 《驻老代表团一九六三年军事友好工作总结和一九六四年工作规划》,1963年12月14日—1964年1月31日,外档,106-00818-02。

④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刘主席与黎笋同志谈话纪要》,1963年5月14日,外档,203-00751-01。

⑤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第五卷,第23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74-576页。

看作是中国对越南在南方推行武装斗争不积极、对寮方武装斗争持谨慎态度的回应。

在越寮对老挝的武装斗争不积极的情况下,中国决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影响寮方。1963年9月19日—26日,在中国的召集下,中、越、寮、印尼共四党在广东从化温泉旅馆召开了四党援寮会议。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美国尚难大规模干涉”“东南亚是世界主要矛盾集中的地区”,他要求东南亚各国坚定信心,并且开具了最终获取领导权取得革命胜利的药方,就是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本主义,具体就是要“争取群众、扩大统一战线”,“深入农村、准备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加强党的力量和对各方面的领导”。这实际上是中国三大法宝的详细版。周恩来还指出,中国会做“可靠、值得信赖的大后方”。^①就在25日的会议上,他提出了中国准备向桑怒派出一个机构。四党援寮会议的召开及周恩来的发言表明,中国已经走在了越南前面担负起了援寮革命的任务;中国领导人笃信中国革命经验在东南亚的普适性;中国期望寮方的革命能带动东南亚的整体革命。

受到中国热情的鼓励,凯山顺势提出请求。从化会议后,他还不时表明自己对苏联的反感态度,投中国所好。到桑怒工作组正式派出前,老挝人民党已成为中国眼中的“反美斗争坚决、对中国革命经验日益重视、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歧认识日益明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②然而,不得不说,凯山的请求是充满实用主义的。他希望工作组的存在能够平衡遍布寮方各单位的越南顾问,为自己争取更大的自主性,同时,也希望中国工作组的存在能为寮方争取更多的物资。

越劳三届九中全会召开前,越南的党政顾问已经遍布寮中央部门和地方各省、县,军事顾问则遍布巴特寮总指挥部各部门及独立营甚至独立连。三届九中全会后,越南决定进一步加强援寮顾问和专家,将顾问派到乡、排、班一级。不但寮方打起仗来全靠越顾问团指挥,而且诸如“干部升迁、奖惩、确定党委委员、处理反革命分子”等内部事务也要征求顾问团意见。“重大问题的决

① 《寮方凯山同志介绍老挝情况的谈话记录》,1963年9月19—24日,外档,106-01425-01;童小鹏:《风雨四十年》下,第220页。

② 《一年来老挝人民党在反美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态度》,1964年1月13日,外档,106-00811-03。

定来自河内而非香农”自然会引起寮方的不满。^①而中国的援老物资几乎全被越方扣下,一小部分被调包后以越南的名义援助了老挝。^②寮方领导人物也多有抱怨。而如何处理与越方的关系也是工作组到达桑怒后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

四、全方位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

桑怒工作组不仅要负责全面工作,更要全面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在工作组出发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或接见段苏权或传达相关指示,具体要求有三点:一是让段苏权认识到老挝问题事关东南亚全局甚至世界格局,因此,不能只知老挝和桑怒;二是要让工作组重点帮助寮方在“建党、建军、根据地、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等方面的问题;三是要求工作组以阶级分析为抓手处理一切问题。^③这些指示表明,中国革命经验既是他们判定寮方存在的问题的参照、又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换句话说,他们期望桑怒工作组能成为中国向寮方输出中国革命经验的载体。

1964年2月,工作组到达桑怒后即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计划,决定由段苏权率领军事组调查寮方在军事和作战方面的情况,梁文英率领政工组调查老挝的经济社会情况,以便做好“向寮方有目的、有步骤地介绍我国经验的准备”。^④然而,调研组一开始工作就遇到越南顾问的阻挠。越方顾问和寮方人员均强调保密,因此,仅组织了一两次临时性的参观。这种情况自凯山3月4日回到香苏后才有所改变。不过,他们在调研过程中依然受到越南顾问设置的种种限制,而且介绍情况的也大都都是越南顾问。^⑤

1964年7月上旬,在凯山的提议下,中越寮三党在河内举行了第二次三党

① 《越方将给我工作组以协助》,1964年1月17日,外档,106-01510-01;《越方介绍顾问团概况并今后联系提出意见》,1964年2月19日,外档,106-00902-02;《三个月来寮、越同志接触情况汇报》,1964年5月9日,外档,106-00806-03;胡正清:《一个外交官的日记》,济南:黄河出版社1991年版,第88—89页;游览:《冷战背景下的越寮“特殊关系”的发展和演变1959—1965》,第95页。

② 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第64页;文庄口述:《风雨同舟话越南:出使越南经历访谈录》(七),盖晨、郭一峰整理,《国际政治研究》2003年第3期,第127页。

③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计划及工作方法》,1964年2月12日,外档,106-00902-02。

④ 《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计划及工作方法》,1964年2月12日,外档,106-00902-02;《复调研工作计划和同越方关系事》,1964年3月18日,外档,106-00902-02。

⑤ 《驻桑怒工作组三个月来与寮、越方同志接触情况汇报》,1964年5月9日,外档,106-00806-03。

援寮会议。段苏权到河内参加会议,周恩来和陈毅指示他仍要以阶级分析为抓手、发动群众,逐步在老挝推行民主改革。周恩来在正式会议上作出以下提议:中越两党协助老党进行社会调查;在桑怒和川圹选择几个点作为民主改革的试点;桑怒工作组到农村帮助寮方做好调研工作;寮方派干部到中国学习。^①三党会议后,工作组立即联合驻老使馆到老挝的解放区进行了为期一月的调研。调研报告建议:必须推动老挝的民主改革、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中国加大援助、促进老挝的经济自主地位;从云南选调有经验的干部来老挝帮助寮方进行民主改革。^②

河内三党会谈不仅以中国的意见为主统一了三方认识,也拉近了寮方和越南顾问团与工作组的关系。7月29日,越寮请求工作组介绍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要求工作组介绍经验。8月5日,“北部湾事件”爆发后,顾问团进一步拉近了和工作组的关系。顾问团总团长阮和提议双方之间应该经常交换意见,顾问团和工作组的关系,应该像当年中越在川圹的经济文化代表团那样互通有无、常来常往。^③越南顾问团还给在川圹前线调研的段苏权等人提供了方便。越南顾问总团给地方顾问团下达指示:“向中国同志汇报情况,就像对越南同志汇报一样”;“相信中国党就像相信越劳中央一样,把中国同志当作总部来的人”。地方顾问还诚恳地向工作组征求意见。工作组感到越方顾问“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向我们介绍一切情况,且主动谈寮方的问题”。^④

正是在顾问团的帮助下,工作组才收集到了有关寮方和川圹前线的一手材料,为工作组之后进入具体工作奠定了基础。凯山也开始频频与工作组接触,并利用晚上的时间前往工作组驻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诺哈也曾请求在川圹前线调研的段苏权介绍经验。这一切都加强了工作组的信心。工作组认为,“现在有了较为有利的条件,应该很好地利用这些已经产生的有利条件,把工作不断推向前进”。^⑤

① 《驻老挝桑怒工作组的几个问题》,1964年8月31日—1964年1月31日,外档,106-00902-01;《中国、越南、老挝三党会谈情况》,1964年7月5—20日,203-00581-3;《越南和寮方社会调查资料和介绍情况》,1964年11月20日,外档,106-00895-01;权延赤、杜卫东:《共和国秘使》,第100—102页。

② 《驻老使馆关于老解放区情况的调研报告》,1964年7月26日,外档106-00806-01。

③ 《越南顾问阮和表示要同我经常交换意见》,1964年9月14日,外档,106-00902-02。

④ 《从调研中看中、越、老关系的新发展》,1964年12月16日,外档,106-00902-02。

⑤ 《驻桑怒工作组对下段工作安排的意見》,1964年11月27日—12月14日,外档,106-00806-05。

最先提上日程的是根据地建设。根据周恩来在河内会谈时的指示,工作组前往桑怒农村调研,8月份向凯山汇报了调研情况。凯山提议研究全国的政治动员计划,并建议以桑怒周围的八个乡为试点,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凯山还希望工作组能派一些干部到农村蹲点,帮助寮方调研。他提议由中老两方组成联合工作组深入农村调研,以选择试点。^①就在段苏权等待中央的指示之时,凯山也把相关情况告诉了阮和。阮和要求越方也派人加入联合调查组,凯山表示同意。这也反映出了凯山的实用主义心态,他曾表示在中越之间“搞点平衡就好了”。1964年底,中央老挝工作组致电桑怒工作组,同意他们的请示,并加派云南省瑞丽县县委书记杨友生和澜沧县县委书记刘淑湘到桑怒加入工作组、负责蹲点调研工作。1965年年初,中越寮三方联合工作组正式成立,并进驻桑怒的香农乡开始试点调研工作。

10月,寮方中央召开军事干部会议,决定在旱季到来后清剿桑怒地区的苗族土匪。在越方顾问的帮助下,寮方制定了详细的剿匪计划。桑怒工作组认为,这个方案有进步的一面,但是“没有对桑怒土匪进行全面的、阶级的、本质的分析,没有认识到桑怒剿匪斗争实际上是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②后凯山向段苏权征求意见,段苏权介绍了中国东北剿匪、湘西剿匪和西藏剿匪的经验,核心就是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配合支持军事斗争。段苏权等人还给寮方集训的干部介绍了发动群众剿匪的经验,并推荐他们观看了中国相关题材的电影《勐龙沙》。^③1965年2月23日,应越南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陈原飞的请求,工作组副组长李文正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剿匪的意见。

剿匪问题也暴露了中越两方一些根深蒂固的分歧。越方顾问也同意发动群众帮助剿匪,但是,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发动群众无非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为群众带来切身利益”,“我们就是靠这两方面来取胜的”。^④1965年3月

① 胡正清:《一个外交官的日记》,第107页;《驻桑怒工作组对下段工作安排的意见》,106-00806-05。

② 《寮方剿匪问题》,1964年10月20日—11月24日,外档,106-01449-02;《寮方在桑怒地区剿匪计划》,1964年11月26日,外档,106-01189-01。

③ 《驻桑怒工作组对下段工作安排的意见》,1964年11月27日,外档,106-00806-05;胡正清:《一个外交官的日记》,第54—59页;《诺哈谈寮方在班班北剿匪及发动群众的情况》,1965年3月14日,外档,106-00897-03。

④ 《越南顾问团团长阮仲永等对老挝问题的一些看法》,1965年1月6日—8月19日,外档,106-00896-01。

14日,诺哈向邓昆山介绍了寮方在桑怒等地的剿匪情况。他说确实如中国电影反映的那样,争取到了群众,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他也表示,还是要在经济上继续改善人民生活。^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寮方依然采取了在双方搞平衡的方式:接受中方发动群众的总的建议,采用越南发动群众的方式。尽管寮方认为剿匪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桑怒工作组认为,寮方还是未能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敌人已经由分散转向集中,群众工作也未能跟上去。

寮方在集中精力进行剿匪的同时,也在越南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1963年旱季到来后的作战方案。1963年12月初,越南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平山向正在川圹前线调研的段苏权送上了该作战方案征求意见。段苏权认为,这个方案虽然字面上反映了7月河内会谈时三党确立的“以游击战为主结合运动战”的方针,但实际上仍是以阵地战为主,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而不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寮方同志甚至没有考虑过发动群众、巩固解放区、逐个歼敌最终取得全国胜利。^②

1964年2月初,越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陈原飞两次向段苏权介绍了巴特寮部队今后几年内的政治工作方向和任务,以及1965年政治工作的计划要点,并诚恳地要求段苏权提意见,以从根本上解决军队建设问题。段苏权从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方向和军队建设的方向中坚持“四个第一”原则(即林彪根据毛泽东军事工作指示和原则总结出来的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出发,认为这个方案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和重视思想工作不够的一面,决定突出“政治思想挂帅”而向越寮提意见。2月20日,总政治部回电工作组也坚持“阶级教育是政治教育中最根本的教育”,要工作组在这一点上多讲。^③

1965年3月底,段苏权根据在川圹地区调查的情况,向中央老挝工作小组报告了巴特寮军队在思想和作战方面的不足:思想上受到越南人民军建军思想和王国军队等杂牌军的影响;作战上仍坚持消极防御的方针,不懂打歼灭战,以击溃战和消耗战居多。^④杨成武迅即回电批示工作组在军队中搞个“样板田”。5月,凯山向工作组表示巴特寮军队的政治思想太弱了,现在到了非加

① 《诺哈谈寮方在班班北剿匪及发动群众的情况》,1965年3月14日,外档,106-00897-03。

② 《关于军事问题调查资料》,1964年12月5日—1965年9月30日,外档,106-00901-02。

③ 《寮方部队政治工作问题》,1965年1月24日—3月7日,外档,106-00900-06。

④ 《关于寮川圹特区部队建设与作战问题报告》,1965年3月27日,外档,106-00901-02。

强不可的地步。他希望工作组能为他提供一些毛泽东著作中关于建军方面的内容,他还表示准备过一段时间后亲自下连队进行调研。看到凯山的热情后,工作组从杨成武的指示和凯山的关切出发,建议寮方派出一个工作组和桑怒工作组一起到某一个连队进行调研,逐步在军队中搞出一个“香农式”的样板田。^① 6月3日,寮方总司令坎代也就巴特寮部队的政治工作问题向工作组征求意见。

之后,工作组成员在寮国战斗部队 613 营 93 连做了为期 28 天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并不是一个连队的问题,而是寮国战斗部队的普遍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没有解决部队思想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问题。^② 思想教育问题成为之后工作组的力抓方向。

“建党”问题也在 1965 年提上日程。3 月,凯山多次告诉工作组,准备在附近选择一个乡作为整顿支部的试点,借以取得整党经验。他还希望工作组介绍中国的整党经验,最好能派人参加试点。6 月,中央复电工作组,同意工作组帮助寮方整顿支部,指示工作组在向寮方介绍经验时要让他们注意发扬党内民主和批评、自我批评,注意整顿和加强支部领导核心问题。^③ 此外,1965 年初,工作组中负责军事援助的工作人员李力开始和寮方直接谈判军事援助问题。总之,到 1965 年 6 月,工作组已经全面开始了在“建党、建军、根据地、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等方面的工作。

自河内会议后,凯山频频越过越南顾问直接与工作组联系不可能不引起越南的警觉。很可能认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早在 1964 年 10 月,越南就将在老挝工作的大部分越南顾问召回河内,让他们总结帮助老挝十年的工作,检讨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建军、作战问题上忽视老挝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④ 而凯山直接越过越南顾问而向工作组征求关于建军、作战方面的经验,也恰恰是看到越方顾问在这方面的不足。1965 年 5 月份,寮方已经决定筹建自己的军校,决定以后中高级干部在军校学习,不再像以前一样多去越南学习,因为学用无法结合,有的回来后思想还落后了。同时,也不得不说,凯山依然抱着着实用主义的心态。

① 《与凯山同志研究军队建设问题的请示》,1965 年 5 月 9 日,外档,106-00898-07。

② 《关于 93 连当前的政治思想情况调查报告》,1965 年 8 月 24 日,外档,106-00901-02。

③ 《关于整顿支部问题》,1964 年 3 月 15 日—6 月 20 日,外档,106-00900-04。

④ 《越方最近总结了在老挝十年来的工作》,1964 年 12 月 1 日,外档,106-00902-02。

桑怒工作组在老挝正式开展工作的时候,也是苏联的印度支那政策的改变期。苏联新领导人上台后,逐步改变了从印度支那“脱身”的政策,开始向越南提供大规模援助。^①到1965年年初,苏联的援助已经质上超过了中国。^②这种情况下,越南因依靠中国援助而默许桑怒工作组存在并在指导寮方革命上走在越方前面的条件已经消失了。1965年3月1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了印度支那人民大会,北越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中也反映了越南决心加强对老柬两党控制的决心。3月底,越劳召开三届十一中全会,明确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解决,南越是关键,南越问题解决了,老挝问题也就解决了,要积极支持老挝把他们的根据地巩固”。^③最为突出的是,1965年6月初,寮方中央常委被悉数召到河内开会,以统一思想认识。尽管此次两党会议有战略方面的考虑,也不得不说是对寮方与桑怒工作组走近的回应。两党会议后,越南决定恢复过去的越寮联军传统,并明确提出改变过去寮方自己搞我们当顾问的做法,要“插手搞”。决定继续以“发展生产、取消劳役剥削、发展生产、解决民族之间的压迫、给贫苦群众带来些利益”的方式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为此决定加派干部赴老工作。^④这一切都说明越南顾问团已决心重新夺回指导寮方革命的主导权。

而两党会议对凯山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从河内回来后,凯山开始疏远工作组,很长时间不再来工作组驻地学习。就整党方面来说,之前说的亲抓整党试点、要工作组介绍经验和对他们的整党计划提供意见也不再提了。越南顾问团开始在整党中发挥主要作用,关于整党学习的文件也换成了越南革命20年的文件。工作组甚至连整党训练班的文件也没有收到。对香农的政治运动凯山也不再热心,对工作组在农村建立阶级组织的建议也不再提了。工作组认为,部队的样板田能否搞成也很渺茫。^⑤凯山的表现还不仅限于此。在两党

① 《周恩来总理与过境我国的苏联总理柯西金第一次接触时谈话记录》,1965年2月6日,外档,109-03957-04;《驻老使馆一九六四年工作总结和一九六五年规划》,1965年1月15日—5月13日,外档,106-00911-01;《越南传达其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两次途经中国情况》,1965年5月11日,外档,106-00860-02;《王炳南副外长三次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或代办(谈苏援助老挝军事物资过境问题)》,1965年6月27日—7月22日,外档,109-03966-03。

② 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载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266—270页。

③ 《越南劳动党中央会议有关内容及决议情况》,1965年4月13日—5月15日,外档,106-00882-01。

④ 《越寮在老挝问题上的一些打算》,1965年7月9日,外档,106-01449-02。

⑤ 《凯山从河内回来后的动态》,1965年8月13日,外档,106-00898-01。

会议期间,他就向苏联提供了援助清单,对此,中国并不清楚。^①同时,寮中央还决定派凯山率领代表团于八月底访问越、中、苏三个兄弟党。1965年年初,他还批评苏联为修正主义,现在却明确将苏联列入了兄弟党行列。

之后,越南顾问也加入了军队的样板田工作。中国根据在613营93连的调查工作,决定在军队中进行诉苦教育、加强阶级教育,解决思想问题。而越方顾问则认为,诉苦教育不适用于巴特寮部队,搞不好就形成了老松、老听控诉老龙压迫的苦,^②是在加深民族矛盾。最终,越南的意见占了上风。^③而香农的政治运动直到1966年初才重新恢复。1966年5月,凯山听取了三方联合工作组关于香农情况的汇报。中方人员认为,老挝的“贡滥主”就是农村中的地主阶级和剥削阶级,认为桑怒有着明显的阶级分化,和中国的云南很相似。而越方顾问则坚持认为,老挝没有什么阶级分化,情况和云南不同。两个月后,凯山再次听取汇报,中方人员杨友生根据云南的经验提出了发动群众批斗贡滥主,把土地分给贫雇农,这种方式再次遭到越方人员的抵制。最后,凯山综合了中越双方的观点和模式,即对贡滥主陶会进行批斗,但不处决,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让他自动交出土地。这说明越南较为温和的土改路线占据了上风。^④

总之,到河内两党会谈后,桑怒工作组已经没有了实质工作可言。越方顾问重新取得对巴特寮牢靠的控制权,加上凯山对工作组的疏远,使工作组在桑怒成了尴尬的存在。工作组设想的帮助寮方“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民族、自力更生”等方面的工作并没有“结出果子”。建党工作被排除在外;建军工作和根据地建设虽然维持了下去,但是,中国的意见并没有占上风;民族(剿匪)工作也失去了发言权;不但没有培养起寮方的自力更生,反而使得寮方更加依靠越南,甚至开始向苏联寻求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经验模式并未得到寮方的认可,桑怒工作组的存在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到1965年底,中国就已经有了撤回工作组的想法。1967年底,大部分人员已

① 《王炳南副外长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拉宾谈话记录:请求经我领土向寮国战斗部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1965年6月27日—7月22日,外档,109-03966-03。

② 老龙、老听、老松是当时老挝的三大民族,其中老龙族处于主体和统治地位。

③ 《越内部对老阶级斗争和部队阶级教育的看法》,1964年1月19日—1965年6月25日,外档,106-00902-02;《越方黄林谈巴特寮部队和农村进行阶级教育问题》,1965年8月10日—12日,外档,106-00896-01。

④ 胡正清:《一个外交官日记》,第107—123页。

经撤回,只留下了李文正等人留守,并将工作组改成了联络组。1968年9月,中央决定全部撤回联络组。

结 论

桑怒工作组代表了一种支援他国革命的新方式,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尝试。工作组的失败从表面上看是由于越劳顾问的阻挠,但实际上也反映出了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工作组派出在特定的背景下,且被赋予与现实极不相称的期望。桑怒工作组派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贯彻“和平共处”总路线的苏联并不支持印度支那的革命运动。这既给了中国证明自己模式有效性的机会,也造就了越南被迫同意中国派出桑怒工作组的条件。然而,模式的成功输出往往伴随的是大规模援助。对此,中国领导人是清楚的,他们认为“中国对亚非拉地区的援助,起了典型的示范作用,是同新老殖民主义和修正主义做斗争的有效武器”。^①因此,毛泽东在桑怒工作组筹备工作完成后就指示,要把老挝爱国战线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全包下来。而在1964年7月河内三党会谈后,周恩来立即答应了寮方关于援助的请求。^②然而,当苏联开始支持越寮革命时,中国的援助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无法与苏联相抗衡的。因此,寮方开始接受苏联援助,越南后来也因援助而倒向苏联。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已经失去了可资推行中国模式的砝码。

其次,中国的经验和模式在桑怒的适用性问题。中国领导人先验地认为,寮方存在的那一系列问题根源在于没有阶级分析,一方面,这未必符合寮方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限制了桑怒工作组的自主空间。桑怒工作组不仅在调研报告中去迎合毛泽东的指示框架,而实际工作中也一切以阶级分析、阶级斗争为抓手。尽管不论是凯山还是越方顾问都坚持老挝没有明显的阶级分化,^③但是,工作组依然认为,贡滥主就是桑怒的地主,老挝是有阶级分化的。桑怒

① 《陈毅副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言》,1963年11月18日,天津市档案馆:x0003-c-015091,第27页。

② 《中国、越南、老挝三党会谈情况》,1964年7月5—20日,外档,203-00581-03;《援助寮方大米、黑布问题》,1964年7月8—25日,外档,106-01180-02。

③ 《寮方凯山同志介绍老挝情况的谈话记录》,1963年9月24日,外档,106-01425-01;胡正清:《一个外交官的日记》,第106页。

工作组与其说是以中国的经验与寮方的情况相适应,倒不如说是在用中国的经验去框定寮方的情况。凯山后来听取越方的意见并非全然是迫于越方的压力,他也认识到,越南的情况与老挝更相似一些,越南顾问的建议也更务实一些。

再者,道义形象与现实期望的脱节。一方面,中国期望输出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又想继续保全支援外部革命中的那种“高大全”的形象。^① 中央多次指示工作组只谈意见,不强迫对方接受;同时,多次强调要尊重越南第一线的位置,在越寮同意后再去参与。^② 他们认为,这样既可以凸显工作组与越南顾问的不同、吸引寮方主动向中国靠近,也又可以让越方顾问对工作组的工作少些妨碍。的确,他们在吸引凯山上是成功的,凯山与工作组的频繁接触也让工作组在凯山身上寄予过多的期望。因此,在整党和军队建设上工作组也开始热心地去直接帮助寮方。但凯山毕竟是实用主义的,在香农联合工作组的组成及剿匪问题上,都可以看出他有意在双方之间搞平衡。对越南来说,桑怒工作组毕竟进入了越南的“势力范围”,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越南势必会反弹。在苏联开始向越南提供援助后,越南加强对寮、柬两党的控制不能不说是受到桑怒工作组的影响;此外,中国对越寮“特殊关系”的不容忍行为也成为之后中越分歧的一个方面。

桑怒工作组成为尴尬的存在、北越逐步倒向苏联也预示着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影响力的衰落。1965年11月,柬共最高领导人首次访华,中柬两党开始建立起了直接联系,中国开始全力支持柬埔寨的革命运动。而桑怒工作组的失败是否对中国决定扶持柬共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是一个值得探究的有意义的议题。

① 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第62—64页。

② 《老挝问题专门小组第二次会议纪要:关于筹建桑怒工作组问题》,1963年11月27日,外档,106-01420-01《驻桑怒工作组的几个问题》,1964年8月31日—1965年1月1日,外档,106-00902-01。